

基督教「中國化」斷想

安希孟

編者註：本文之內容並不代表本社之立場，內文不少觀點值得商榷，惟作者以中國非基督徒學者身份，對基督教作了愛之深、責之切的批評，可看為誼友之忠言，值得深思、反省。

導言

基督教傳入華夏神州，實為單一封閉的中國文化，增加了一道異質亮麗的風景線，使中華文化更呈多姿多采。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對封建的、封閉的、獨斷的中國文化以猛烈抨擊；給迷信的、多鬼的、落後的民間信仰以極大的觸動。

然而，中國幾千年農耕文化的反抗力甚巨，排斥基督教的種種嘗試從未絕跡。中國改革開放，國門大開，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無任歡迎。然而，一些人卻仍舊熱衷於基督教「中國化」，以中國舊有的（包括「改革開放」拋棄的、和行將被拋棄的）的文化習俗及政治意識形態，重鑄基督教神學，視西方神學思想發展若「無睹」。

基督教生於地中海開放的商業文化背景中，實同「自我封閉」、「自視過高」、「自以為是」（三自）、劃地為牢、閉門稱霸的小農意識迥不相侔。我越來越感覺到，基督教「中國化」與中國的「世界化」是一個兩難選擇。我們不幸把「中國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學與教會」前面，似乎封閉僵化、拒絕外部輿論乃「民族化」題中應有之義。

西方傳教士的「基督教中國化」

細數起來，封閉的「中國化」概念由來已久。從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昔日那些越山航海而來的西方傳教士，乃是人類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們奔馳萬里，拋別家鄉的優越生活，來到中國邊陲不毛之地及窮鄉僻

壤，給中國文化帶來新的生機，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今天，基督教在中國已成為「三教九流」中的一教一流，得到合法承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歷代傳教士的開啟工作。如果歷史的研究不數典忘祖，就不應抹煞中西文化史上這艱難辛苦而感人肺腑的一章。

基督教對於古老的華夏文化，實為一種革命性改造力量。然而，由於中國不是一般封閉的國家，故基督教極難進入。傳教士只得遷就，甚至儒冠儒服，變改基督教的初衷，入朝為官。基督教傳教士初次來華，為迎合中國民眾心理，採取了一些變通辦法。然而，其中有不少不足稱道的弊端。如，唐代景教採用儒、佛用語。本世紀初的「本色教會」運動中，有的教堂採用佛教禮拜儀式，焚香燃燭、跪拜誦經。也有人編寫中國民謠式的讚美詩。這就是基督教「儒教化」、「佛教化」。

近代的「基督教中國化」

1926年，中國基督教會有人建議保留迷信的中國節日，提出除聖誕、復活等基督教節日外，還應保留三種「孝親敬祖」的節日——清明節，集中本族親人於墓地，由家長司儀祈禱、唱讚美詩、講祖宗善德、清掃墓地；追遠節，即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亦即鬼節；孝親節，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亦舉行祈禱、唱讚美詩。這種儀式如真的實行的話，也會令人捧腹。基督教原來根本反對鬼神迷信，反對祭拜拜天等活動。我越來越覺得，上述基督教「中國化」包含嚴重、封建迷信色彩。

50年代，就有人提出教會的任務是「在政府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適合中國需要的制度」。我認為完成這樣一項宏偉、艱巨而無比光榮的任務，是革命政黨領導一國萬民所做的，是教會力所不及的。教會不是革命的政治團體，不是社會改革機關，教會是須要管理宗教事務和儀式。這正如醫院的任務就是治病救人一樣。醫生們不應丟下病

人去上街遊行、喊政治口號，或者去打土豪、鬥地主。醫生不是政黨領袖，不是革命宣傳家，他不應對「資產階級」病人進行政治批判。同樣，牧師只應牧養人的靈魂，不負社會革命的責任。

又有些牧師在講道時說，耶穌是「木匠出身」，是「工人階級」，故提倡培養無產階級「新神父」、「新牧師」，要學習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攪通思想，再去宣教。我始終納悶的是：若堅持唯物主義，就應當消滅宗教。宗教專業者怎麼忽然要學習唯物主義呢？也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天堂」，因而不必信基督教的「天堂」。有人甚至說：「上帝就是真理。真理在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可以找到。所以加入共產黨就是崇拜真理。崇拜真理就是崇拜上帝。」這番話肯定會引起共產黨員的反感。難道宗教的「真理」可以等同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嗎？

「本色化」教會與「處境化」神學的倡導者，亦圖謀使基督教及其教義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有人認為，《聖經》中的「新天地」，指的是「社會主義」。似乎社會主義的建立，《聖經》中的盼望就到手了。然而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並非極樂淨土。

又有一位先生把基督教的「愛人」歸結為：愛自己的國土，愛社會主義制度，愛自己的人民，愛自己的國家的公正的政權（三自）。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基督教已兩千年。不知道這兩千年基督教是否就談不到愛。對基督教的「愛」做這種解釋，在列國歷史上從未見過。耶穌創立的基督教，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及國家政府都是有缺點的，應當允許人民批評。然而，用狹隘的民族主義代替基督教「普世一家」、「萬國大同」的思想，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

又有的神學學者提出：「是否為發展生產力服務，是衡量宗教工作的標準」。宗教原本是在熙熙攘攘的經濟大潮之外給人的心靈以安靜之處，可現在心靈也不得安寧了。我們知道，宗教信仰同物質感官幸福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如果宗教團體的目的不是為了信徒的精神需求，而是為了社會的經濟發展，那麼有甚麼必要設立宗教嗎？

某地基督教自編詩歌「十勸」：「一勸公婆仔細聽，

千萬莫與媳婦爭。吃穿莫少她一點，你愛媳婦主喜歡。」
「一勸媳婦仔細聽，千萬莫與公婆爭，你孝公婆盡力行，真神幫你增福壽。你娶媳婦與你同，賢良媳婦落好名。」
教會牧師豈充當了家居委員會的職能；有的地方教會動員交「公糧」。我納悶的是，政府機構幹甚麼去了？

由此可見，「本土化」、「處境化」、「中國化」的神學強調從「實際國情」出發建立神學，其實包含著對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著對現實的不恰當的妥協、默許與遷就，從根本上把信仰與非信仰，宗教與非宗教混淆起來。

中國「本土」神學的一些現象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莫過於把國務政治活動與宗教信仰儀式混為一談。這種「本土」特色的宗教並不一定比「外國」特色的宗教優越。例如：「神學教友要本著恪守天主誠命和愛國愛教的精神，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反帝愛國運動。只有同全國人民一道堅決擁護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認真作好本職工作，才能中悅天主聖意，符合聖教會以及廣大神長教友的根本利益，才是愛主愛人的具體表現，同時在政治覺悟方面有較大的進步。」其實，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普天之下都是一致的，無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無所謂「中國」與「外國」。難道還有社會主義基督教與無產階級神學嗎？天主並不特別計較信徒擁護哪個黨的領導。戰場上誓不兩立的教徒，同樣都蒙受上主悅納，在上帝眼中一視同仁。上主並不特別偏袒堅持某一世界觀和意識形態的人，敵視另一些人。

又如：「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通知在明天接見全體代表，這給大家以極大的精神，大家滿懷激情，熱切祈求天主降福給首長身體安康，祖國繁榮富強。」如前邏輯，天主並不特別祐助某一支軍隊或某一個國家。上帝降福於一切人。自己國家強大，自己身體健壯，是屬世的事務，完全是自己努力與保養的結果，不必仰賴上帝。

基督教會不應「以階級鬥爭為綱」，反倒應該以「愛」為綱。然而，教會有時會成為渲染仇恨與暴力的場所。如說：「反對我們的人，就是站在我們的敵人方

面。」這樣激烈的階級鬥爭話語出自「信徒」之口，付人咋舌。人莫予毒，不允許別人反對，更使人吃驚。我認為，人非聖賢，熟能無過？怎麼可以不允許、不聽取別人的反對意見呢？怎麼一反對你，就是敵人呢？對於政治上、信仰上的「敵人」，我們究竟應當採取甚麼態度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嗎？惡惡相報嗎？本來很講博愛謙卑的基督教會，有時反倒凶神惡煞，容不得反對意見。

「中國教會」有些人說：「西方有些人企圖重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歷史舊夢，妄圖使其成為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工具。有極少數人對堅持『三自』原則的中國教會肆意攻擊，他們信口開河、道聽途說、歪曲事實，甚至無中生有、捏造謊言、欺騙海外信徒。」我們又一次看到犯「企圖」罪的思想犯；另外，只要一宣佈對方是「極少數人」，就可以把他們打翻在地。對「三自」難道不可以批評嗎？

我歷來認為，甘冒斧鉞之刑來華的傳教士們，以生命為代價，傳來西方文化與神學，是文化交流的神聖使者。沒有他們，大概也不會有今日的「官辦教會」！經常看到國內有些自身不能自主卻剝奪外國人自由的人的豪言壯語。別人連議論、批評的自由也沒有，必須像中國教會那樣「聽黨話、跟黨走」嗎？

現代國家實行法制。宗教不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不是一國之上層建築和官方意識形態。然而有些時間，教會人士竟充任政府官員發言談話。如下面的標題：《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就所謂中國的「宗教迫害」發表聲明》。所涉及的是「中國政府拘留所謂著名宗教人士×××」。我就異常納悶：「政府」是司法機關嗎？「政府」還可以拘留人嗎？「政府」拘留的×××若觸犯法律，自有法律和執法機關來審理和發表聲明。「三自愛國」教會是基督教的一個肢體，它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它並不負責司法審判。逮捕是否恰當，審判是否公正，不應由基督教協會來「聲明」。其身也不過是法律管轄下的宗教的一部分，並不能全然代表法律。

還有的人認為教會的職責與功能類似於公安保衛或安全機關，把安全機關的工作職責硬塞給教會：「堅持獨立自主，同時效法耶穌潔淨殿的榜樣，反對任何外來勢力對我國教會的干涉和控制，警惕並制止少數壞人假

借宗教名義造謠惑眾，挑撥離間，製造分裂，以及進行非法活動。」然而，教會團體不是國家安全機關，不行使政治權力，不具備主權職能。對「壞人」的制裁，也只能由司法機關以法律為根據來進行，教會無權打擊「非法」活動。我國是以法治國，不是以宗教治國。教會無權對信仰方式不同的人說三道四。

有人說：「愛教就應當愛國，越愛教就應當越愛國，天主教的愛首先是要愛近人同胞。」天主教的愛竟然也有親疏差等嗎？天主教的愛就是愛國嗎？難道天主教包含了階級鬥爭與國際鬥爭嗎？沒有人說過愛藝術、愛鮮花、愛科學，首先必須愛國家、愛政黨、愛領袖。這裡牽涉到基督教的本質問題。基督教在政治上是大同觀念的，超出國家、家庭、種族以及階級的界限。昔日的家庭宗教、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均被這一普遍大同宗教所代替。基督教不屬於某一家族、某一國家、某一地區、某一階級、某一社會、某一人種、某人性別。

從產生以來，基督教就對整個人類發言。耶穌說：「你們要去，讓萬民作我的門徒！」耶穌提出「獨一上帝」作為全人類的崇拜對象。他不偏袒任何一部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沒有異國人、陌生人、外姓人、外地人之說。這個宗教不煽動對異國人的仇恨。相反，它對仇人，異國人負有正義與仁愛的義務。國家界的界限也被打破。

在歷史上，拿基督教為種族計劃服者不乏其人。弗裏德裏希大帝強迫軍隊信仰上帝，路德教的牧師必須宣誓：「我誓以至誠宣誓服從並效忠於普魯士國王，我將努力培養人民使之忠於祖國、服從法律、尊敬國王之忱備。凡與公共治安有害我的結社，我絕不贊助參加；凡有害國王的密謀，我若有所知，必先報告國王。」這可以說是「三毛愛國」的模範。教會還可以向官方「告密」！德皇閱兵時則說：「日爾曼人是上帝的選民，我，德皇，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寶劍、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戰將。」這裡愛國與愛教、國家與教會是一回事，如聯體嬰兒，不可分離。

第一次大戰中：德國牧師拉赫曼(Lehmann)說：「德國是上帝所計劃的世界的中心，德國向全世界宣戰，乃是上帝精神對於世界之汙濁、罪過、奸邪的懲罰。」足見德國教會及牧師成為愛國主義培養機構與宣講負

員。不僅德國如此，其他國家也如此。有人慨嘆說：德國人說上帝在德國人一邊，法國人說上帝在法國人一邊。難道今天上帝忽然又站到中國人一邊，即站在中國的那一部分特別優秀的人一邊嗎？

教會不應當是培養愛國情操的場所。培養愛國主義可以參加各種政治文件的學習，可以進黨校、上黨課、看愛國電影、參觀歷史博物館和偉人紀念堂、瞻仰墓碑、讀革命小說等等。人們進教堂，是為著宗教的目的，出於宗教的動機。

我認為，既然信奉耶穌創立的宗教，就不必穿官服，當幕僚，當議員。社會和尚、神父、修士、阿訇，均不得以其宗教身份議政參政——他可以以平民身份參政；他必須代表平民，而不代表政府。

在所謂「中國化」的潮流中，淡化「因信稱義」可說是一片小浪花。「因信稱義」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宗教改革家們提出的適合自由平等的口號。宗教信仰的本質是「信」而不是「行」。強調「行」，會激發一種表裡不一的偽君子行為，而「因信稱義」則典型地表達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信」——的態度。淡化「因信稱義」，就是淡化「信仰」，那會怎麼樣呢？一種宗教公然要信徒「淡化」自己的信仰與信念，我就有些如墮五里霧中了。

坎默在《基督教倫理》中說，我們容易把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描繪成美德與價值的中心。這樣，我們就可以從道義上證明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合理性。「我們對國家的忠誠影響著我們以寬闊的胸懷去評價國際的公正和需要。」然而，他認為，猶太—基督教是以對上帝的忠誠來評價人間的忠誠的。其他的熱愛和忠誠應當服從於對上帝的熱愛和忠誠。他正確地說，「上帝是全人和宇宙萬物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不是民族神。然而，狹隘的民族主義把普世上帝變成民族和國家的上帝。基督教永遠被極端民族主義所嫉視。在不能消滅基督教的地方，民族主義者便溫和地使基督教蛻化為民族主義工具。

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愛」與「忠」（三忠於，四無限）是一種盲目崇拜，它把特定的、有限的、局部的團體和個人變成人價值的中心與偶像。然而基督教卻主

張，對特殊的團體和個人的愛（個人崇拜），永遠不應當成為價值與意義的核心。我們不應當把特定的愛（愛父母、愛朋友）和忠誠（忠於某個黨派和民族）當作價值的中心。我從來認為，基督教對中國政治文化是批判的武器，它會刷新中國人的心。然而，基督教會的學者意識不到自己的責任，以「入教作官」、「作代表」、「作委員」為目的，成了教會官僚。他們滿口流行的政治術語，把時下政治口號與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

一點期盼

我國學術界、教育界、工商界、文學藝術界，都對五十年代的許多重大「冤假錯案」加以糾正，連胡風、潘漢年、俞平伯、武訓都得到重新評價；胡適、徐志摩、周作人、梁實秋等人的作品都在大量印售。然而，令我感到非常難解的是，基督教會對五十年代一些重大事件卻沒有重新予以評價。

中國已經推翻了封建王朝。封建皇帝不懂得「宗教信仰自由」，他可以把「傳教自由」視為洪水猛獸。然而，今天的人不應當把皇帝引為知音。在任何時候，封建專制王朝的宗教迫害都不是「主權國家」引為自豪的事。我們應當懂得，中國海禁大開，外人傳教自由，乃是我們的自由的一部份。自由、平等、人權概念進入中國，只要不被皇帝及其順民「中國化」，一定會使封閉的中國踏入現代民主國家行列。我們一如既往地尊敬這些傳教的先賢與聖徒。

我隱然覺得，鄧小平先生倡導「思想解放」，中國的社會思潮澎湃激盪奔放時，教會仍在禁錮中，教會的領袖與學者未能補上這一課，這使得中國教會未能省視自己的歷史。我希望，教會與中國社會及世界文化主流齊頭並進。我相信，中國「入世」，會對中國基督教產生應有的推動。中國基督教「走向世界」、乃是它自己原來的「題中之義」。

（編者按：篇幅有限，文章部份內容經刪節；標題乃編者加上。）

作者安希孟，畢業於北京師大外文系、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現為山西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和宗教學教授。